清代社会文化生活研究的一项新成就

——评游子安博士的近著《劝善金箴—清代善书研究》

侯 杰

一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是相信和肯定人性是善良的，只要自省、慎独、内修、自律，就会有好的结果。这与基督教的“原罪”说截然相反。那么，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中又是怎样贯彻实施的呢？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科目中心的游子安博士的近著《劝善金箴—清代善书研究》，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答案。

所谓善书，就是由乡绅们撰写出来的一些规善惩恶、宣扬社会道德的文字，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中也包含着通俗化了的儒家思想观念、佛教和道教的宗教精神和说教，通过善人、善堂而流传开去。不容否认的是，在中国社会上，善书曾经和戏曲、小说、家礼等形式一样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甚至充当了维系中国社会结构稳定、道德秩序平衡的重要方式之一。可惜的是，有关善书的研究在中国大陆却十分缺乏，只有最近些年出版的一两部资料集，和参杂在有关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研究著作中的一些分析。游子安博士受香港省善真堂的资助在大陆出版的这部书，可以说是填补了中国大陆学术界此项研究的一个空白点。

二

通览全书，不难发现其特点是十分明显的。该书内容丰富，首先对于主题进行了详细界定，评述了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追溯了清代以前善书流传的历史，然后着重阐明清代乃至民国初年的善书发展变化历程。他比较关心地方官员的在宣讲圣谕的过程中、民间秘密宗教通过扶乩得到神灵引导等对民间的教化、劝导。在评述善书的内容、特点的同时，进一步研究善人、善堂与善书印刷、出版、流通的关系。

善书贵在流通，只有这样才能劝世化人，引人向善。也正因为如此，与修善、行善相伴随的善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士庶们在家修持，以善书为经典，在日常生活中也以此为道德实践的标准，与人同善的人们聚会在一起时，都要劝善一番。许多善人斥资刻善书，以便推广。同时，积极采用民众容易接受的图画、歌谣等方式，以利于不识字的妇孺。作者还通过个案研究，具体分析善书作者们，包括制作者们编印善书的社会背景、思想来源及其宗教原因。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非常细心地注意到善书教化功能与流通变化，和时代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书后附录中有部分书影，和贺箭村在 1934 年编辑的《古今善书大辞典》、研究资料等珍贵资料。

该书不仅按照功过格类、《阴骘文》与《感应篇》注本类、修身处世类等几大类，描述了清代善书的发展，以及受考证学风的影响，各种善书丛书、类书、全书的流行，而且阐明灾变频仍之下晚清劝赈善书、乩坛扶鸾著造善书、以“救劫”为主题的善书的开始盛行。作者不仅在有关清代善书的个案研究中，揭示清代善书的流通及其意义，而且没有受大陆学术界以 1840 年鸦片战争为界，把清史研究一分为二的做法的影响，注意探讨善书在晚清，乃至民国时期的发展流变状况，为人们比

较全面地认识和了解善书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剧烈动荡的社会条件下的存在以及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结合等方面的情况提供了便利。作者认为该书论述的时代上溯晚明，下至民国年间，以有清一代的善书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晚清，中国社会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在善书中也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一方面，末世劫变的观念流行，劝人悔过迁善，以避劫难的文词充斥其中，对鸦片毒害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的关切，对兵戈不息、灾害不断的恐慌等都集中于关帝善书中。另一方面，提倡崇正黜邪，反对西方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成为湖南等地善堂以及周汉等人刊印、散发反洋教宣传品的重要内容。

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发现基督教传教士在试场外面免费派送“圣书”及公开宣讲教义，这些传教方法与善书印送和宣讲的传播方式，实有契合之处。再者，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有编刊善书的传统，外国传教士因势利导，散发布道书刊。更重要的是，在写作要旨上，两者都是“劝人为善”，要求人们悔过迁善。于是，中外劝善书刊同在科举试场外，或通衢大街上相遇，又同时争取影响以劝化人们，可算是饶有意味的文化景象。

三

其次，作者对该项研究经年不辍，很有心得，也有全盘考量，非一蹴而就之作。在游博士眼里，清代善书的普及，跟当时社会发展相互关联，包括宣讲活动有利于道德教化的推广。而民间宗教的蓬勃、慈善组织的兴办、刻书数量的大增和地区扩散等，也都有利于善书的流传。其中善人的活跃、善堂的林立以及三教合一的文化趋向等都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善书在这一时期为什么会如此流行。而善书与圣谕、家训、格言、宝卷、蒙学等文献资料则共同构成庶民教化的素材，汇成一套完整的道德训诫的文献。至于从宣讲圣谕到宣讲善书，再到清末民初的“说善书”，中国社会文化经历了不小的变化。在传播方面，除文字之外，还广泛采用了宣讲说唱、演出戏剧、镌碑刻石的方式，从而使儒家礼教和宗教伦理进一步通俗化和大众化，亦使善书在地方社会教化上产生作用。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游子安博士也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观点。比如作者认为：清代善书除了秉承过往善恶兼采、法戒并陈的写法外，内容更具体细致，显示社会分层劝戒的特色。对应着士农工商、官吏幕宾、医家等等不同的社会阶层、职业身份，详细地开列劝惩项目，堪称中国社会道德的指导书。善人如潘曾沂和余治等人，因为与民众接近，所以比较理解民众的心理，而善书内道德格言也多与庶民生活相关，诸如善书所强调的自求多福、行善积功、诸恶莫作及冥界裁判，或切合民众趋利避害的愿望，或与民众敬畏鬼神的信仰相符，因此，善书是了解中国民众信仰和生活规范弥足珍贵的资料。

而为了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善书的传播，作者还专门介绍了当时为劝人不论贫富、不拘形式、不限场所，随时可以劝善印送，清中叶善人开始整理较具体详明的善书流通方法等情况。为此，他还不厌其详地归纳出清末民初各种善书流通的 14 种方式。正是通过这些流通方式，善书流行开去。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游子安的这部书侧重于善书的版本鉴定，进行过艰难的书志学研究工作。不仅着眼于善书的具体内容分析，而且对版本、序、跋、凡例、募刊疏引，乃至捐资者的姓氏、书坊广告等都给予充分重视，详加考定。这才使进一步研究分析成为可能。

据笔者所知，游子安前前后后用了 8 年的时间，从香港、北京、天津、西安、上海、广州、台湾等地的图书馆、善堂寺观和私人收藏、公私书店中搜集、购买了大量的研究资料。正是由于他锲而不舍的常年努力，终于掌握了数以百计的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在中国社会当中流传的各种善书，并构成他进行研究和写作的坚实基础。诚如著名学者欧大年教授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游子安博士的著作是研究清朝善书中最全面、详尽的一部。此书在前人研究成果(酒井忠夫的《中国善书的研究》，1960，及 Cynthia Brokaw：《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the Late Imperial China》1991)的基础上，就清朝善书正好进行了补足的工作，并提供更多有关清朝善书的资料。”他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

(作者侯杰：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邮编 300071)